



Nansilafu
Sanji

南斯拉夫散记

叶君健

四川人民出版社

1253/19

南斯拉夫散记

叶 喆 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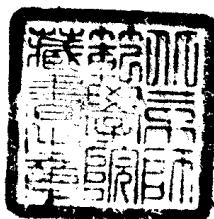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成都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78149



778149

封面设计：陈尔泰

南斯拉夫散记

叶君健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4.375 插页2 字数84千

1980年8月第一版 1980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6,300册

书号：10118·354

定价：0.43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作者于1979年参加在南斯拉夫斯洛文尼亚共和国举行的国际作家会议期间写的十篇散记。里面有对南斯拉夫锦绣河山和历史文物的颂扬；有对德国法西斯入侵这个国家时所犯罪行的谴责；也有对以铁托元帅为首的老一代游击战士用生命和鲜血写下的光辉历史的讴歌；也有记述工人参加工厂管理而促进生产高涨以及工人们日常的幸福愉快生活；而更多的还是记述作家在会议中的活动情况。

作品具有叙事简洁、情思隽永、含蓄深沉的艺术特色。

目 录

布莱德湖畔 · · · · ·	1
远足野餐 · · · · ·	8
萨拉热窝的国际诗歌节 · · · · ·	16
一对出租汽车司机 · · · · ·	24
“老游击队员”及其他 · · · · ·	35
两个工厂 · · · · ·	54
一处幽静的地方 · · · · ·	71
“诗人的职责” · · · · ·	84
波黑共和国巡礼 · · · · ·	102
在一个城市共和国里漫步 · · · · ·	118
附录：世界人民间的文学交流 · · · · ·	130
后记 · · · · ·	134

布 莱 德 湖 畔

布莱德不是一个小镇，也不是一个山村，而是一个湖——一个在山上的湖。周围一块半圆形的地带就是因它而得名，成为一个游览胜地。它位置在南斯拉夫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境内，在阿尔卑斯山脉的西端。从这里可以望见阿尔卑斯山名叫尤里安的一段，那里最高的山峰特里格拉乌高达九千三百多英尺，它白皑皑的尖顶直接插入云端。这里还可以看到阿尔卑斯山名叫卡拉宛根的那一段，它的最高的山峰荷赫斯吐尔也有七千三百多英尺高，同样是终年积雪。就在这个湖东北边那个半圆形的地带上，耸立着两个近代化的旅馆，每个旅馆设有三百多张床位。谁也不会相信，在这个清幽的山间湖畔，每天居然有那么多的游客来观光，而且还要在这里住上几天——因此每个旅馆天天总是客满。

没有想到，我也成为这里的一个旅客。我们——黄钢同志和我是五月九日早晨八点半钟从北京起飞的。由于时差关系，到达南斯拉夫得减去七个钟头，因此飞机在贝尔格莱德机场降落时，表上的指针还不过是刚刚指向下午一点。在机场休息室喝了一杯汽水后，我们就又登上另一架飞机，向斯

洛文尼亚共和国的首府卢布尔雅纳进发。到达目的地时，斯洛文尼亚笔会中心的副主席、剧作家米洛西·米尔根同志已经在机场等候。时间是那么紧，连到市区去观光一下的机会我们都得放弃了。我们坐进他的汽车，由他开往位置在北边百里路之外的湖区——这就是布莱德。当我在一个旅馆的房间里安顿下来以后，打开窗子一看，布莱德湖就出现在我的眼前。

湖水远望去蓝得发青，使这个新月形的小湖看上去象一个海湾。从我所站立的那个方向——东北——远眺，它也确实象一个海湾，因为在它的西南一端出现了一个小岛，它堵住了再向前展望的视线。这形势就造成了一种假象，使人觉得小岛的另一端就直接通向大海。岛上有个古教堂。这时天色已晚，湖上逐渐升起一层薄薄的烟雾，它在教堂伸入云霄的尖塔周围缭绕，更使人作出许多遐想。从这儿把视线再沿着对岸的群山向东北方转移，便又可以看到另一个古教堂，但它不再是立在湖上，而是站在一个悬崖之巅。它的样子显得有些孤零，但却也给人一种苍劲之感。它不时在向人们提醒它的存在：它的钟楼在传出那多少世纪以来就已经形成了习惯的晚祷钟声——当然现在时代不同，再没有人到那里去作晚祷了。这钟声在这幽静的山区，引人作出一些更漫无边际的遐想。我不相信，这天早晨我还在人烟稠密的北京。我当时就觉得好象是置身在一个童话世界。

当然我还是在人间，而且是在一个国际社会形成的人间。晚祷钟声过后，我看了看表，时间已经是晚六点半。当晚

布莱德所属的拉多乌里加公社议会主席要在这里举行一个招待会，招待从世界许多国家到来的作家代表。原来由斯洛文尼亚共和国作家协会和笔会中心联合召开的国际作家会议就在这里举行——精确地说，会场就在我们所住的旅馆的大厅。我们这次就是应斯洛文尼亚共和国作家协会的邀请前来参加这个会的，不过我们已经晚到了两天，正式会议已经在这一天开始了。这个地区的领导人这时才举行招待会欢迎各国来的客人，是否还有等待我们中国作家到来参加的意思，我们当然不敢做这样的推测。不过作为多年第一次来到南斯拉夫的中国作家，我们确实受到东道国各方面人士热情而又诚挚的欢迎。

招待会在旅馆后山上的一个房子里举行。我一走出旅馆，便看见来自世界许多不同地区的作家，也从旅馆里漫步出来。他们三三两两，边走边谈，向山上走去。大家很快就汇集在伸向招待会的会场的一条路上。虽然我们彼此都不认识，但到底是“同行”，共同的语言不少，我们无须介绍就攀谈起来，而且还谈得相当投机，因为有许多话题我们早就有所考虑，甚至在某些看法上还有同感。就我个人而言，我们一交谈起来，还有“他乡遇故知”——特别是那些从西欧来的作家——的感觉，因为我们在欧洲有许多共同的朋友，因此我们一开始交谈就一点也不感到生疏。招待会上的气氛非常热烈和友好。参加的作家一共有一百来人，代表二十三个国家，当然南斯拉夫几个共和国的代表还不计算在内。在这样一个清幽而又有古朴感的山间湖畔，这确也是一件不

平常的事情。

第二天我们正式参加大会。会议的议题有两个：“文学作为普遍主义的工具”和“文学作为人民之间的桥梁”。

“普遍主义”这个名词直译出来是“宇宙主义”(universalism)的意思。按照大家在发言中所表达出来的阐释，我们对于这个词可以作出这样的理解：人类发展到了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我们考虑问题已经不能再单纯从个别国家或民族出发，而应该把世界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看待——即所谓“宇宙主义”。文学在促进人民之间的理解和团结方面起着桥梁作用，因而也是促进“普遍主义”的一种有效的工具。但文学作为这方面的有效“工具”究竟应如何理解，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看法。我们自然也有我们的解释。我在大会发言（发言全文见书后附录）中，结合人类历史的发展，引用了歌德和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两段话，来说明我们的观点：

“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诗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民族文学’这个词现在已经没有多大意思了，‘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临近了。我们要努力加速它的到来。”（歌德在一八二七年一月三日与爱克曼的谈话）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

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当然这两段话是在蒸汽机时代说的，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电子时代。实际的生活更证明了这两段话的正确性。文学不单是一个“工具”问题，还是我们时代精神的一种表现。它现在在向一个更广泛的范围发展：“世界文学”。但我在发言中同时也强调，“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学。相反，我们更应该发展我们各自的民族文学——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更高的水平。我们所应该放弃的是我们从旧时代所继承下来的那种片面的、狭隘的观念或者大国沙文主义和对自己国家文学所持的那种狂妄自大的态度——这种情况在我们今天的世界里也并不是完全不存在。我想，我们现在所指的‘世界文学’就是世界各国人民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学的总和。”

当然我们只是各抒己见。我所表达的这种看法，别国的作家也不一定同意，也没有要求他们同意的必要——不过事后了解，绝大多数与会作家，不论来自东欧或西欧，都同意这个观点。他们的发言自然也是如此。的确，会场上的气氛倒是颇有点“百家争鸣”的味道。好在这只不过是一个作家交换意见的集会，并不要发表宣言或作出决议。大家意见虽然不尽相同，但正如我在发言中所指出的，目的基本上应该是一致的：那就是大家都希望共同努力，“使我们能创造出一个更合理、更公平、更繁荣、更有文化的新世界。”

所以整个说来，会议厅里一直是洋溢着一种同行的谅解精神和友谊。

整个会期前后一共是六天，时间不算太短。但我们却觉得日子过得非常快。这是因为每段时间都充满了活动，中间很少间隔——对于我们中国作家来说，尤其是如此。我们一离开会场，总有许多不同国家的作家走过来和我们交谈。有些南斯拉夫的作家由于在一般情况下找不到机会，就在我们吃饭时走过来，很有礼貌地问：“我可以和你们坐在一起吗？”他们或者和我们共餐，或者叫一瓶啤酒——如果他们已经吃过了饭的话，坐在一起和我们交谈。当然我们交谈的范围也不限于文学。我们还接触到许多其他的问题，如中南人民的共同友谊和我们在民族解放斗争中所体验过的相同经历。我们的交谈越深，我们就越发现我们两国人民确是具有不少的共同点。

我们这样的接触，整个说来，范围还是有限。但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和其他个别共和国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却使我们能有机会和更广泛的南斯拉夫人民见面。他们安排了好几次电台访问和两次电视访问——每次电视访问的时间总不少于四十分钟。有一次电视访问还特别安排在美丽的布莱德湖上，让周围的风景给我们的交谈提供一些富有诗情的背景。游艇在清平如镜的湖水上荡漾，微风徐徐地从侧面吹来，倒真使人觉得好象是置身于一种诗的境界。我们不得不认为这是我们中国作家在这里所得到的一种特殊待遇，而我们为此也感到骄傲，因为这也是南斯拉夫同志们对我们一种深厚感情的

表现。

不难想象，我离开布莱德的时候，我心里是多么感到依依不舍。这里的湖光山色，这里的晚祷钟声，这里我们所遇见的南斯拉夫朋友和他们从各国所请来的作家们——包括他们的举止言谈和音容笑貌，就是在我写这篇散文的时候，犹历历如在眼前，好象这一切都发生在今天的早晨。

远 足 野 餐

按照欧洲的标准，五月中旬正是春天的全盛时期，在靠近意大利和奥地利的南斯拉夫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则更是如此。它位置在南欧和中欧的边缘上，在阿尔卑斯山西部的尾端；从气候讲，它实际上原属于欧洲的温和地带。春天在这里也确是温柔。除了远方阿尔卑斯山西段的一些山峰上还有积雪外，处处是一片清新的绿色，连悬崖绝壁都覆上了灌木和青草。我们从世界许多不同地区来的二十多个国家的作家，乘着两辆旅游大轿车，在南斯拉夫几个共和国的作家代表的陪同下，一吃完早饭就向这个浓郁的春天深处进发。

我们的出发点是斯洛文尼亚共和国的山区风景胜地布莱德——我们已经在那里开了几天的“国际作家会议”，现在仍然住在那儿，但这却是最后一天。也正因为这是最后一天，我们的主人——斯洛文尼亚共和国的作家协会和笔会中心——特别组织了这次旅行，目的地是一个更高的山区公社拉杜乌里加所属的一块山间草场。带队的就是这次国际作家会议的主席波加齐尼克同志。汽车在伸向丛山的柏油路上前进，速度不是太快，我们因此也得有机会比较从容地浏览

两边窗外的风景。

这里的山区也和别处的山区一样，是一层接着一层的连绵不断的群山——中间当然也偶尔冒出几座峰峦。大自然对这些山并没有什么特定的布局，它们自发地向不同的方向铺展开来，给人的印象是：“自由自在”。如果说它们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它们在挺拔中有俊秀，在浓郁中有清新。没有一块嶙峋的山石赤裸裸地暴露着自己。它们不是披着由青苔所形成的绿衣，就是由蔓藤所织成的地毯。它们的外表很整齐，这说明它们很有教养；当然，这也反映出这里的气候宜人。这个特色也表现在这里的居民身上：我所遇见的斯洛文尼亚人差不多都是整齐清洁，彬彬有礼与和蔼可亲。

我们的车子在一个桥头停下。我们要从这里开始步行。一个新的境界在等待着我们去探索。我们越过桥头，走进一个山谷中间。现在我们已经不是群山的观赏者，而是群山的一个组成部分。一股激流从我们上边靠右的峡谷冲来，穿过桥孔，向左边的峡谷奔去。峡谷随着激流向前延伸，越伸越窄，越紧，因为两边的山在相互靠拢。要不是这股激流在奔腾地向前撞击，可能两边的山早已合龙。这股激流在它们之间劈开一条出路，形成一道深沟。水虽然清澈得象开花的香槟酒，但这条没有尽头的深沟却见不到底。为了能让游人欣赏这里的奇观，当地的居民就沿着山腰凿出一条栈道。我们就是要沿着这条栈道向前走进更深的山坳。

下边的峡谷越变得窄狭，激流的冲击力就越变得狂暴。当激流在两边的石壁中间向前滚滚奔驰的时候，浪花就象脱

缰的野马，腾空飞跃起来。空气又从周围向它们包围过去，浪花在反包围的过程中又再度开花，变成烟雾。这烟雾又逐渐向周围膨胀，把我们笼罩起来。所以我们就好象是在雾中行进。我们当然能辨认出彼此的面孔，也能听到彼此的声音。这样，山峡、激流、石壁、烟雾、人声，交织在一起，使人就好象置身于虚无缥缈的空间。但我们并没有失去头脑的清醒。我们知道，稍一不慎，我们就有失足落水的危险。这种大自然的奇观和伴随着它的“惊险”，又使我感到这次远足实在不平凡。

我们终于走出了“栈道”，来到一座山的斜坡脚下。空间显得豁然开朗，我们头上是一片蔚蓝的天。激流也开始变得缓慢了。我们这时就更改行程，甩下激流，开始沿着斜坡爬山。在“栈道”里和我同行的是国际笔会总部的秘书伊丽莎白·帕脱生女士。也许我们讲话太多，也许“惊险”的激流已经使我们的神经感到疲倦，一来到这个缓慢的地带，我们的步子就不知不觉地松懈下来了。帕脱生女士就干脆停止前进，凝望着她面前的这座高山。这时加拿大的女作家路薏丝·德波伊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土耳其籍的作家哈尔曼恰好在我身边擦过。他们两人倒是有说有笑，兴致盎然，我也受到他们这种情绪的感染，便大步跟上前去。在会议期间，我们虽然多次相遇，并且也几度相视微笑，但却没有在一起聊过天。现在机会来了，我们也有时间，于是我们便成为爬山的旅伴。

我们边走边谈，也不知时间飞走了多少。待我们停下步

子，抬起头来看时，太阳已经走上了中天，我们也来到了山顶。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小块山上的平原。这里只有蔓草，看上去很象一个牧场。的确，离我五、六十米远的地方，我们就看见一圈类似篱笆的东西——也许它就是羊圈。但那里没有任何牲口，只有人影在移动。不一会儿，我们就瞥见会议的主席波加齐尼克同志，他在遥遥向我们招手。原来这就是我们野餐的地点。那些人影就是先我们而到达的各国作家们。在那“羊圈”里的一个角落里袅袅地升起了一股炊烟。

篱笆有一个缺口，我们走近前时才知道这就是进入野餐地点的大门。这里站着一个穿着当地民族鲜艳服装的村姑。她抱着一束鲜花。每一个人走进篱笆，她就亲自在她或他的胸前插上一朵花。她代表这里的主人——那些住在附近树林中村落里的居民——向我们表示欢迎。那发出袅袅炊烟的地方原来是村人临时搭起的一排烤炉。主人正在那里烤款待客人的当地香肠和猪排——农家的猪排，又粗又厚，象一块大饼。这里没有服务员，每个客人可以拿取盘子，到烤炉那边领取一份酒菜。这是一次别具风味的野餐。在我们这些外国客人看来，这不仅说明这里农村生活的富饶，也象征当地人民对我们的热情。

在较远的一个角落里有一个凉亭，那里有一位同样穿着民族服装的乐师在手风琴上奏出跳舞的曲调。一些兴致高昂的朋友们，被那些欢快的民族旋律所激动，都放下手中的杯盘，纷纷邀请自己所熟识的异性对象，翩翩起舞。在另一个

较远的角落里出现一个村舍，人们可以在那里购买饮料。附近一些作坊和小型工厂的工人有时就到那里休息，喝半蛊啤酒。那里正有几个工人在指手划脚，相互谈笑。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在评论我们这些异国来的客人。但这种场景却吸引住了我。我便也走了过去。没有想到，斯洛文尼亚笔会中心的负责人波加齐尼克同志和该中心的秘书安妮娅·乌尔西齐女士也在那里喝酒，无疑他们是在谈论我们。一位身材魁伟、手脚粗大的中年人，一看到我走近，就猜出我是一个中国作家。于是他就把举着酒杯的手伸过来，挽住我的胳膊与我的手臂交叉，各自同时干了一杯。这是西方久别的老友庆祝重逢时的一种饮酒姿式——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一个工厂的厂长，是从工人中被选出来的。那位笔会的女秘书安妮娅这时也痛饮了一杯，要求我回到那个凉亭里去和她跳一场舞。虽然我一再申明，一个两鬓班白的人和她这样一个活泼的金发女士伴舞，恐怕不是对她的恭维，而是失敬。但她认为这样一种解释本身就是失敬。的确，在整个会议期间她是一个辛勤而又能干的工作人员，给予了我们不少关怀和照顾，我们没有理由违反她的意志。尽管我的双腿笨拙，我也只好跟着她，向那个发出手风琴舞曲的凉亭走去。

整个场面是热烈的，这实际上是“国际作家会议”后的一种“联欢”——也可以说是会议的一种继续。的确，会议进行期间大家所表现出的那种严肃气氛，现在全都消散了。每个人都不拘形式，脸上洋溢着的是一种轻松和愉快的表情。由于南斯拉夫主人的殷勤好客，二十多个国家的作家们